

廿一世紀我國

高等教育之展望（下）

黃炳煌 文
方雯瑩 圖

二、在經濟方面

國內十幾年來在經濟上的卓越表現乃是有目共睹之事。據最新報導，台灣今年平均每人國民生產毛額將高達七千二百三十七美元，在全世界排名第廿五名^⑮。經濟繁榮的直接結果，就政府來說，便是可以增加教育投資；而就人民而言，便是更有餘裕讓自己的下一代接受更長、更好的教育，經濟繁榮的結果，必然會導致對於更多的技術、專業和經營管理人才的需求。同時，經濟機會的擴大也會產生「廣開高教之門」的社會需求。總之，經濟發展為高教發展帶來了充分的生命力。

又經濟繁榮的結果，使得國民的經濟結構發生改變。從去年開始，國內服務業的人口首次超過製造業人口，而高達總就業人口數的43.7%^⑯。為了適應此一趨勢，專科學校的類別和各科招生人數勢必要作一番調整。再者，由於從事服務業的人員所面對的是「人與人」，而非「人與物」之間的關係的工作，其所接受的教育內容必會更加重視人文和社會科學的陶冶（包括人際關係的訓練）。

經濟繁榮的結果也會導致教育觀念的改變。經濟落後的國家只把教育當成一種「投資」或「生產工具」，想透過教育去培養有關的（尤其是經建和科技方面的）人才，以便推動國家建設。但是到了經濟富裕的階段，衣食住行的問題多半解決之後，人們便開始把教育也視為是一種「消費」，不再企望它生產些什麼——如獲得學位、文憑、高職、高薪等——而只是純粹為了滿足精神上、文化上的需求或心理上的自我表現。這種把教育也當做是一種「消費」的觀念上的改變，實在是推動今日或今後大學推廣教育的一大作用力。

唯必須一提者，經濟繁榮為高等教育所帶來的，未必盡是一些有利的影響。從長遠來看，高教從業人員的相對收入（即與具同等學歷的其他專業人員之收入相比，以及計入每年通貨膨脹的比率）可能會降低。因此，對於如何吸收優秀的大學和研究所學生進入高教工作的行列，並防止現有的優秀高教同仁為其他公私機構所挖走，教育主管當局實不宜坐視而不早為謀。

三、在政治方面



由於民主理念的更加落實，國內政黨的運作日臻成熟，以及兩岸關係的逐漸改善，將會使高教行政逐漸脫離中央集權制，而轉為更加重視省市政府以及各大學院校（尤其是私立學校）的自治和自主權。在教育內容上，則目前的一些泛政治化（甚至黨化）的現象將會日漸退色。而在教育（尤其是訓育）方式上，則將更加重視學生的意見和權利，使得教育手段更加合理化、人性化。

四、在社會方面

其影響又可分為下列幾方面：

(一)人口因素

台灣地區的人口剛於民國七十八年七月十六日達到二千萬。又據經建會預測，到民國九十年時，台灣人口將達二千三百萬，一百年時為二千四百六十萬，到一二二年時，因總生育力降低而臻於零成長。而在人口的組成方面，預計六十五歲以上人口所佔比例，將由目前的5%，逐增至民國八十五年的7%，民國一百年時將為9%，而到民國一二二年人口零成長時，則將高達18%。總之，人口老化的現象，將是未來人口發展的一個重要特徵^①。

隨著生育率的降低及年輕人口之減少，未來的高等學府將會利用剩餘的物質和人力資源，去擴大它的社會服務的功能（此一現象目前已在美國發生了），而在老年人方面，則由於內在心理需求——如為滿足知識上、文化上和精神上（如需要伴侶等）之要求——會紛紛去敲叩大學之門。

(二)在家庭變遷方面

將出現下列幾種現象：(1)單親家庭增加，(2)未婚（包括未成年）生育增多，(3)工作婦女人口增加，「雙生涯家庭」日趨普遍，(4)晚婚

晚育等。家庭環境的劇變必會影響到青少年身心正常發展，而日後高等教育中輔導部門的功能與角色將會日形重要，而其任務亦將日形艱鉅。今日在一般高等的學府中有名無實的輔導中心或輔導室，勢非徹底改弦易轍不可。

(三)其他

社會價值的日趨多元化以及民間團體的興起，對於今後高教政策之擬定（例如最近發生的僑生保送大學的爭議）以及課程內容（如美國的「多文化教育」（multicultural education）正大行其道，將發生相當大的影響力。

五、在文化方面

杜維明在七十七年十二月廿九日參加由聯合報所主辦的「中國的廿一世紀——知識份子的期待」研討會中曾經指出：「回顧過去十年，或放眼廿一世紀，我想至少在北美洲或歐洲有兩股思潮，表面上看來是衝突的，但又有內在的連繫，值得我們借鏡，一是『全球意識』（global consciousness），另一方是『尋根的意識』……」。放眼廿一世紀，它們將發生相當大的力量^②。而七十七年八月廿八日，在「廿一世紀基金會」所主辦的「邁向廿一世紀：問題、議點、方向」學術研討會上，文化組的報告也特別提出：「未來的文化發展應同時兼顧國際化與（本土）文化認同的平衡」^③。個人非常同意上述不約而同的見解，並願從文化的角度，去探討這二股思潮對我國今後高教發展的可能影響。

由於交通和資訊科技的日漸進步，國與國之間的藩籬實際上早已不存在，整個世界已形成一個「國際村」（global village）。在這個密不可分的環境裡，不同國家人民之間的往來和不同文化之間的交流已是「勢所必至，莫之能禦」。舉例而言，即使政府佈下天羅地網，



還是無法抵擋透過衛星傳播而進來的所謂外國的「文化侵略」。這一次中共政府為「六四天安門大屠殺」所編的一片謊言，便被大陸留學生從美國所發出的 FAX 和「美國之音」所徹底突破和揭穿。

在美國高等教育課程中最新的變化便是，修習外文（尤其是中日兩國語文）的人數日多，而所謂「環球教育」（global education）更是被大力推廣。「環球教育」與傳統的「國際教育」有別。後者主要是在強調國際間的教育交流（如互派交流生、學人），取人之長，補己之短。或藉外國留學生之來學，將本國文化宣揚出去，是「利己」的成份大於「利他」。而「環球教育」最主要的宗旨在使學生了解，我們人類本來就是「共坐一隻船」，無論是在文化、經濟、環境各方面，彼此息息相關，利害與共。因此要彼此互敬、互愛、互助，以利共存共榮，是「利他」的成份要多於「利己」。

具體而言，環球教育的目標是在：（一）使學生清楚了解，我們的世界本來就是一系列相關的系統——包括物理的、生物的、經濟的、政治等系統。（二）使學生明白本國史與世界文明發展之間的關係。（三）使學生經常注意到國內和國際間文化型態的多樣性。（四）增進學生對於國際問題的分析能力。而在訓練學生分析國內重大問題時，更能注意到其國際的涵義。在美國環球教育正在如火如荼的進行中，且更有專設的委員會在大力推動中。反觀在我國，「環球教育」一詞尚為一新鮮名詞。為早日培養廿一世紀的良好公民，我高等學府實應急起直追，積極培養學生的「環球意識」，以免未來使他們淪為「世界孤兒」。

美國高等教育課程上的另一發展趨勢，便是重視少數民族文化的研習。為使廿一世紀的

美國公民能與國內其他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們和平相處，彼此合作，美國最近幾年來特別重視「多文化教育」（multicultural education）的課程設計和教學。尤其是位於西岸的幾所名校，為了迎接「太平洋世紀」的來臨，更於最近幾年來，經過無數次的校內紛爭和辯論，終於先後完成了文化必修科目的修訂。例如，1988年史丹福大學的教授代表會議，以卅九對四之比，表決通過從今秋開始，把原來的「西方文化」必修科，改為「文化、觀念與價值」（Cultures, Ideas and Values），其內容除包括歐洲文化之外，尚應包括世界其他的文化以及美國境內少數民族的文化。此外，對於有關種族、性別和階級間發生的爭論性問題也應一併加以必修。而加州柏克萊大學也在經過數年的反覆辯論後，終在1989年四月廿五日，經全校教授會議以極接近的比數（二二七對一九四），通過「美國文化必修科」。因此從一九九一年起，柏克萊加大學生在畢業前必須修習「美國文化」，而其內容則至少要涵括三種族裔文化——任選歐裔、亞裔、西（班牙）裔、黑人及美國原住民（印第安人）五科文化中的三種，作一比較研究。

這種重視少數團體文化研究的「尋根意識」，表面看來似與第一股潮流的重視「環球意識」有所矛盾與衝突，實則不然。一般人總認為，如要強調「整體」，勢必要降低甚至犧牲「組成部分」或「個體」的價值。其實，「統一」（unity）並不等於「一致」（uniformity），它不必然與「分殊」（diversity）相衝突。「統一」的團體不但不與「分殊」的部分或個體相衝突，反倒是分殊的個體可以豐富整體的內涵（如果部分擴充充份協調、統整的話）。文化的國際化可以取人之長、補己之短，而文化的本土化也可以使它有所貢獻於世界文化。

國際間的文化交流，總是要拿出自己與眾不同的文化特色——而不是他人文化的翻版——去跟人家交流。史丹福大學與柏克萊加大之新文化課程，對少數民族學生而言，是要培養他們的「尋根意識」，而對居主流文化的白人學生而言，則是要打破他們根深蒂固的「白人至上主義」(White supremacy)的思想，加緊培養他們的「環球意識」。真可謂兼籌並顧，一石雙鳥。

國內的文化教育，即使在高教階段仍脫離不了「大漢沙文主義」的框框。爲了培養廿一世紀的良好公民和領導人才，我們除了要繼續世界主流文化的教學之外，更需強化對少數民族和本土文化的研究與教學，方不致產生一大批自視過高，但卻兩腳不著地的「文化稻草人」！

附 註

- ①陳雅玲，只向「錢」看——解嚴後的「知識勞工」，光華雜誌，14卷7期，七十八年七月號，頁九十。
- ②Change Magazine, Vol. 15, No. 7. Oct, 1983, p.15.
- ③John Naisbitt, Megatrends. Ten New Directions Transforming Our Lives (New York: Warner Books, Inc, 1982), pp.1-2.
- ④"What the Next 50 Years Will Bring," U.S. News and World Report, May 9, 1983, Vol.94. No.18, pp.A1-A42.
- ⑤Lena Williams, "Futurists Gather in Washington to Dream a World," The New York Times, July 19, 1989, P.B1.
- ⑥D. Keith Lupton, "Editorial: Innovation and the Future of Higher Education," Innovative Higher Education, Vol. 11, No.2, Spring/Summer

, 1987, pp.79-81.

- ⑦K. Patricia Cross, "Education for the 21st Century," NASPA Journal, Vol. 23, No.1, Summer, 1985, pp.12-15.
- ⑧John J. Cogan, "Citizenship for the 21st Century: Observations & Reflections," Social Education, Vol.53, No.4, April/May, 1989, p.243.
- ⑨Herbert E. Striner, "Changing Economy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Postsecondary Curricula," Educational Record, Vol.64, No.4, Fall, 1983, p.39.
- ⑩Economic Planning Agency, Japan in the Year 2000 (Tokyo: Government of Japan, 1982), p.85.
- ⑪National Council on Education Reform, Fourth and Final Report on Education Reform (Tokyo: Government of Japan, 1987), pp.5-10.
- ⑫見中國時報，七十八年四月廿五日，頁15。
- ⑬K. Patricia Cross, "Education for the 21st Century," NASPA Journal, Vol. 23, No.1, Summer, 1985, p.10.
- ⑭San Jose Mercury News, July 9, 1989, p.5c.
- ⑮見美洲世界日報，七十八年八月一日，頁14。
- ⑯見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出版之就業市場季報：七十七年年報。
- ⑰見中國時報社論，七十八年二月廿五日，頁3。
- ⑱見美洲世界日報附刊「世界周刊」，七十八年三月十二日，頁11。
- ⑲「中國論壇」，第三二二期，七十八年二月廿五日，頁19~20。

(作者：國立政治大學教育研究所教授)